

台北的雨

人生閱歷 童心

4月的台北，雨是常客。除了雨，我還能牽掛些什麼？文友小翔前幾年去澳洲定居，在中學做音樂老師的球友阿捷去夏威夷進修……台北越來越陌生了。周五深夜的台北機場，有些涼，也有些冷清。末班捷運上，我一個人佔據了一個車廂。窗外黑漆漆的，從桃園到新北，一直到了台北車站，才見到溫和的光暈——路燈依舊是玉蘭花燈罩，對於四月，這很應景。只是，這夜，沒有雨。

「冬季到台北來看雨，夢是唯一行李……」冬已逝去，夢卻沒有逝去。我的行李那麼簡單，一個中等的背囊，裏面除了兩件汗衫和證件之外，只帶了幾本書和幾張素描畫。那是我8年前在台大進修時隨手畫的，都是關於台北的雨夜：西門町的紅樓在雨中朦朧着；士林夜市在雨中聚集了大小不一的油紙傘；萬華剝皮寮的紅磚拱廊在雨中有些落寞……我凝視着這些畫作，又看看窗外，輕輕地問自己：它們都還好嗎？這次，短短的4天假期，我還有幸遇見雨嗎？

第二天，我去了貓空。茶園還在，新綠的嫩芽綻放着又一個春天。山間賣麻糬的店家換了新人——子承父業，20多歲的阿昊把陽光的笑容連同台灣腔濃厚的粵語一同放進裝麻糬的小盒子裏。那盒子上的簡單畫，是雨天裏打開的傘。唉，雨天，你又在哪儿？

最後一天，去爬了象山，風和日麗，看了夕陽。慨嘆着搭捷運回酒店，剛剛進酒店大堂，外面忽然傾盆大雨。我一下子有些驚，坐在大堂的茶吧緩神，卻聽見有人在彈鋼琴，那曲子正是《冬季到台北來看雨》，我的心一下子就醉了。有雨的台北，才有靈魂。「輕輕回來不吵醒往事，就當我從來不曾遠離……」這個4月，我在台北，何其有幸，有雨。

他鄉港聲

梁家儀 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信而有征 劉征

好友劉飛越君在荷蘭的攝影展大獲好評。在萊頓大學的展出剛剛結束，4月23日，他又馬不停蹄去鹿特丹辦展。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看他的作品了。上一次，還是在杭州。當時，他和一些攝影師聯展，在一間十分空曠的大型展廳，空蕩蕩的，就好像他攝影當中的那個內蒙古的草原一樣無垠。

這次不同，展覽被安排在萊頓大學圖書館一樓的IIAS（國際亞洲研究院）。在這裏，有大塊的落地玻璃，從裏面一個抬頭，就看到這些作品環繞着整個辦公區域，就好像它們生來就掛在此處。然後，它就發揮出了與展覽大廳不同的效果。那就是，這些作品當中所蘊含的深厚歷史感通過內蒙古人粗糙的臉龐、身上的民族服裝，以及那草原被傳遞到這所大學，而大學的氛圍又加強了這種厚重的味道。

於是你不得不承認，感染人的藝術從來都不是外生的，它本身蘊含着一種性格。這性格既來自於這位內蒙古攝影師本身，也來自於那個特定的大自然，以及牧民身上流露出來的一整套生活方式。那種不自覺流露出來的神情，在被放大的照片當中，給人以粗糙的真實。而它最妙的地方在於，它讓我們意識

東北鄉訪童年莫言

窗常開 潘明珠

別誤會東北鄉是在我國東北，這裏實在在高密、膠縣、平度三縣交界處，因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書中總出現高密東北鄉的名字，此處已成了文學之鄉了。

走進高密東北鄉這個紅高粱小鎮，無論遇見何人，只要一說要找莫言舊居或莫言小學，人人都熱情地給我們指引。這裏處處都有莫言影子，譬如東北鄉作家協會的大指示牌「筆嘮書屋」，就是由莫言題字的哩。莫言書法好，又非常支持家鄉文化活動和東北鄉的作家，常出席此協會的活動呢！

路那邊正在曬高粱小麥的農民，指着一處民房說：「那裏就是莫言喜歡到的澡堂。」我們沿着路，經過售賣高粱酒的店，不久後來到位於膠河南岸的平安莊，這就是莫言的老家。走入這土坯房，地面不平有凹坑，院子裏仍有昔日的石磨；莫言童年時與他爺爺、奶奶住過的房間，仍鋪着發黃的蓆子。踏入這樣一個封存了舊日時光的舊土房，彷彿看到、聽到童年那個男孩——莫言正趴在那扇窗戶上說：「從這兒可看到膠河的水在眼前流過啊！」

莫言就是在東北鄉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出生的。像許多貧苦農村的子弟，他的童年生活，是處於放養的狀態。

但土坯房粗茶淡飯的生活，阻擋不了他敏銳的文學發展，他是從自己的直覺、摸索獲得創意的，通過想像奇遇，他創作了幻想豐富，以及滿載魔法創意的《透明的紅蘿蔔》，一鳴驚人，於文壇上嶄露頭角。

走進莫言曾經就讀的小學（即高密縣河崖人民公社大欄小學），我彷彿穿越到那苦難的年代，看到小莫言穿着破爛的衣衫，背着媽媽給他縫製的書包（包內只有石板、石筆和舊書），但高興與上學去。我不禁跟着他的步伐，走入課室，聆聽于錫惠老師的課。于老師是莫言小學時的啟蒙老師，他的學名「管諫業」就是于老師給他起的。他長大後寫作時，把諫字拆開，才有了「莫言」這個筆名，可見他對這位啟蒙老師有很深印象，並很尊敬她。莫言說：「我的文學生涯，是從我童年走進學校那一刻開始。」

大欄小學原址，如今已活化成青少年的文學教育基地，讓生活在豐盛年代的少年人可體悟這文學大家的成長之路。



莫言小學課室 作者供圖

當景泰藍遇上數智AI

前，他說創匯時期的工藝美術品是真正的「國潮」先行者，當年靠着這些精美的手工藝品賺外匯的同時，讓全世界認識了中國工藝的水平。旁邊的中國工藝美術協會漆器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劉丹聽到了我們的聊天也湊了過來，和我聊起漆器和景泰藍兩種燕京八絕工藝的跨界合作可能性。不遠處原學習出版社學習時代網市場部總監陶林燕看到我揮了揮手，他給我講了不少創匯時期景泰藍的鑒定技巧，短短的交流讓我這個非遺愛好者也成了半個入門選手。

開幕式上，主持人提到廣東省創意產業協會會長、蟻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錦富因事不能出席，特意以視頻形式發來賀詞，祝賀展覽順利舉辦，希望未來繼續加強粵港澳大灣區與京津冀的文化產業合作。開幕式後舉辦的文化數智產業轉型論壇上，我見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國外文局美洲傳播中心創意設計部主任梁泓溢和我聊起中國文化出海內容創新，說他們正在做面向北美地區的中國文化推廣項目，我們當場探討如何用數智和AI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放到他們的海外傳播平台上；天津文化產權交易所副總經理閻揚錫和我探討了非遺數字資產的確權和出海路徑，說天津文交所正在搭建面向全球的文化數字資產交易平台，想邀請香港的機構作為合作方參與；天津數據研究院、津投數藏負責人潘寧給我看了他們剛做的景泰藍數字藏品小樣，3D建模的景泰藍瓶可以360度旋轉查看細節，做得特別精美，我和他說可以研究和香港

對接，做景泰藍數字藏品的全球首發。茶歇的時候，大廠金漆鑲嵌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申偉達給我帶了他們新做的金漆鑲嵌小書籤當禮物，和我聊起金漆鑲嵌和景泰藍兩個燕京八絕工藝的聯合出海計劃。山東來的朋友們也特別熱情，山東泉智數字科技集團總裁文武帶着CTO武立輝一起過來和我聊天，他們公司是做數字孿生技術的，說可以給景泰藍的整個製作流程做1:1的數字孿生紀錄，永久保存工藝數據；山東出版數字融合產業研究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欣倍也過來和我聊起景泰藍的AR出版項目，說他們有成熟的AR出版技術，可以做到掃一下景泰藍圖片就能跳出AR工藝講解的出版物，以後有機會在香港做繁體版。

一天的活動下來收穫滿滿，站在展廳裏看着那件件泛着溫潤光澤的景泰藍作品，我彷彿能看到半個世紀前工匠們伏案工作的身影，也能看到未來這些帶着中國溫度的藝術品，通過數字技術走到世界每個角落的樣子。鑾金歲月綻芳華，匠心傳承譜新篇，景泰藍的故事從過去走到現在，也一定會在我們這代人的手裏，走向更廣闊的未來。



活動合照 作者供圖

神韻

是在等待一個適宜的環境，比如，一所大學。那時候，它被激發出來的令人感覺異樣的心情就令人印象深刻了。而這是早已注定會出現的，早在它被創作的那一刻，而不是相機這項技術出現的那一刻。

因而，本雅明所慨嘆的現代複製技術破壞了藝術品的光暈，在這裏，卻似乎不盡然。複製性的技藝，譬如攝影術，固然改變了一種圖像呈現方式，就好像互聯網改變了信息呈現的方式，但是技術改變的只是表達本身，而不是作品的神韻。

作品的神韻，有賴於藝術家的直覺。這直覺孕育着作品的原型，以及藝術家自己。那是連藝術家本人都無法控制的。它在那裏，不是要去驚艷誰，而是在吸引適宜它的一切。

飛越君的照片就是如此，它們被放置在了一個適合的環境，這個環境加強了這些照片的韻味。最妙的是，你無法僅僅通過視覺去衡量一張照片，就好像相機這項技術的「產品」因其可以被無限複製就被看作是廉價的。然而，有一些獨一無二的東西早在被拍攝的時候，就被注入到了這些作品當中，只



劉飛越萊頓大學個展《山那邊》一角。 作者供圖

鄧麗君與蔡幸娟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鄧麗君是將舊日國語時代曲帶回神州大地的第一人。那個年頭全中國歌迷都是聽鄧麗君的歌，這也是鄧麗君人生的一大幸運，既趕上了時代的激流，也同時推動了這股文化回饋的波瀾。

鄧麗君的知名度和受歡迎度都是空前絕後的，踏入二十一世紀，國人的娛樂多元化，人人都聽錄音帶的時代已成歷史陳跡。所謂「國語時代曲」，據筆者的理解是上承上世紀三十年代以降上海的七大歌后，到解放後大批音樂人南來香港，又有一支輻射到台灣的「老歌」。其間港台兩地的國語電影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那些「老歌」歌詞的風格，繼承了唐詩宋詞的韻律。而今天大家常說的「華語歌」，歌詞就向新詩、散文詩那邊傾斜去了。

鄧麗君與香港淵源也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很多台灣唱家跑過來香港獻唱。鄧麗君紅透中國半邊天之後，不少後起之秀都競相模仿。曾與鄧麗君長期合作的作詞家莊奴（本名黃河）公開表示：「我聽過好多好多『鄧麗君』，坦白地說在台灣，在各地，除去蔡幸娟之外，沒有作第二人

選。」蔡幸娟則說：「其實聲音跟她（鄧麗君）有一點像，可是我用的方式……比較沒有想要去特別模仿。」實情是蔡幸娟不單不翻唱過鄧麗君的名曲，上世紀三十年代以降所有國語時代曲歌后前輩的首本曲她都翻唱得八九九，自己也有許多首唱名曲。故此除了「鄧麗君」之外，還有「東方雲雀」「中國娃娃」「東方女孩」「小調歌后」等外號。在廣義的「華語樂壇」也是大師級的存在。

許多戲劇曲藝界宗師都認同「學我者生，似我者死」的金句。若說蔡幸娟有學鄧麗君，那也只是指某些歌詠技巧和深情投入。鄧蔡兩家同樣唱一首名曲，聽眾都能分辨出是誰在高歌。其他許多「鄧麗君」追求「似」，甚至除歌聲外，髮型、衣着都要死硬硬地「拷貝」個十足十。或可以叫聽眾短暫驚艷，終究無法臻於上乘之境。第一次聽蔡幸娟的歌，是在「油管」(YouTube)聽到的一曲《月桃花》，這曲旋律有點熟，但未識歌詞，後來才知是姚莉的名曲。當時的感覺是怎麼有人可以唱得這麼好聽？當時娟姐穿了一襲桃紅色的連身裙，簡單的舞姿帶動裙襬旋轉，秀色可餐也。

然後……就認識了「蔡幸娟香港歌迷會」的一眾朋友了。

一張畫紙的執着

我常被畫班的學生問：「應該用什麼樣的素描紙？」對初學生和用於練習，我都不會有什麼特別要求。而且若我告訴他們我學習時老師對素描畫紙的標準，可能會嚇怕他們，大部分人都無能耐學習了。我在意大利一所俄羅斯美術學院學習時，在素描寫生課首天，老師便要求我們為畫紙「加工」。首先我們得去美術用品店買來質素好的白色素描紙。紙品一般是愈厚愈厚紙質纖維愈細膩，較好的素描紙重約230g至400g。而大小則因應自己所繪畫對象和構圖而定。一般我們會買IK（約78cm×109cm）然後別開成兩張，二人合購，可節省金錢。此外要買來較2K少一點的厚木畫板。

為何要紙厚而韌，看老師的示範我們便明白。她教我們以大掃沾水，令畫紙的一面全濕潤，水要足夠讓畫紙飽滿地吸收並變軟，但又不能影響紙質令其變得太薄，這時要讓畫紙有時間吸水。在畫紙軟化後，我們把濕的一面放到木板上，然後把握時間將紙拉至最緊，在木板四處厚邊按上大頭釘，其間需要一定的力度，卻不能用力過度——沾水後的紙容易易被扯破。我們常弄得滿頭大汗，十隻指頭發痛，要同學們互相幫助。不時會聽到有人慘叫，這時便意識到有人扯爛了畫紙，要再花錢買一張了。這功夫的目的就是要將畫紙拉緊固定在木板上。之後我們需讓畫紙「風乾、收縮」，歐洲天氣乾燥，三兩天便乾透了，這時畫紙牢牢地貼在畫板上，畫畫時十分穩固，不會輕飄飄地移動，用筆起來感覺超爽。

大家聽來可能也會覺得工序繁複，當每畫一幅前都要做這番工夫時，就會有躲懶的念頭。我曾經取巧直接在畫紙上畫畫，被老師扣分了，實在無奈。也真佩服那些從俄羅斯美術學院培訓出來的學院派老師，他們對繪畫要求的執着，由一張畫紙開始，至工具、構圖、用色，都追求完美，所以能有不一樣的效果和美感。

AI的「黑箱」困境

小狸上周寫了《灰色敘述者》，再上周寫了《在素白中起舞》，朋友一看樂了，說再寫個黑的湊黑白灰系列吧。主意不錯。那寫就寫AI的「黑箱」(Black Box)困境吧。想寫這個是因為最近看了一篇帖子，有人(用AI)總結了Reddit上2,600條回覆，發現今時今日AI對普通人生活的滲透度，或者說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對AI的依賴程度已遠超預期，從求醫問藥到學習工作再到法律援助以及居家日常，人們正將越來越多的判斷外包給AI。

AI做的決策越來越多，這讓人類被迫面對了一個日益嚴峻的問題：人類創造了最強大的工具，卻越來越無法解釋它是如何運作的。這便是AI領域中著名的「黑箱」困境。所謂「黑箱」，是指一個系統的內部運作邏輯對於外部觀察者而言是不透明的。在傳統的電腦程式中，邏輯是線性的、規則導向的，工程師可以追蹤每一行代碼的執行路徑。然而，現代神經網絡，特別是像大語言模型(LLM)這樣的深度學習架構，其運作方式更像是一種「湧現」的結果。數十億甚至數萬億的參數在多層的神經網絡中交互作用，當我們輸入一個問題，模型給出答案，但中間經歷了怎樣的特徵提取、權重調整與邏輯推演，即便是開發者也難以給出精準的解釋。

「黑箱」困境不僅是一項技術難題，更是一個深層的哲學與社會問題。首先，「責任」無法定義了。如果AI決策錯誤而導致損失，那麼責任該由誰承擔？是開發者、數據提供者，還是AI本身？在法律與倫理的框架下，缺乏「可解釋性」(Explainability)意味着無法進行有效歸因。其次，「偏見與公平」是如何處理的？AI的學習過程依賴於海量數據，而這些數據往往承載着人類社會歷史中累積的偏見與歧視。當模型在「黑箱」中進行運算時，這些偏見可能會被放大，甚至產生意想不到的歧視性結果。比如，在招聘篩選或貸款審核中，AI可能因為某些隱晦的關聯性而排除了特定族群。人類看不到決策過程，也便無法維護公平。

然而，我們是否應該因為「黑箱」的存在而停止探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深度學習之所以強大，正是因為它能處理人類大腦無法負荷的複雜維度與非線性關係。若強求AI的每一步決策都必須符合人類可理解的邏輯，那將極大限制其性能與創新的能力。好在，面對「黑箱」困境，人類也並非完全無計可施。當前，「可解釋人工智慧」(XAI, Explainable AI)已成為學術界與產業界的研究熱點。研究者們試圖開發各種技術，努力為「黑箱」安裝一扇「觀察窗」，讓我們至少能窺見其運作的邏輯輪廓。此外，人類還需要建立一套與AI共存的「信任機制」。這種信任不應建立在對技術的盲目崇拜上，而應基於對系統邊界的清晰認知。我們必須承認，AI是一個「概率機器」，而非「真理機器」。在涉及法律、醫療、國防等關鍵領域，我們不應將最終決定權完全交給AI，而應採取「人機協作」的模式，由AI提供建議，由人類進行最終的審核與把關。

AI的「黑箱」困境，並非一道無法跨越的牆，而是一場漫長的對話。我們害怕「黑箱」，本質是害怕失去對世界的掌控權。在這場對話中，我們正是要學習如何與另一個強者共處。